



《新記(大公報)史稿》,吳廷俊著,武漢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大公報》全史(1902-1949)》,吳廷俊著,復旦大學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聯合出版,二〇二三年。

大公報記者 張帥

創辦於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的《大公報》，迎來一百二十四周年華誕。這份目前唯一創刊逾百年的華文報章，在學界被公認為中國新聞史學研究的「富礦」。

「《大公報》堅持『文人辦報』本色，並以它自己的實踐，為中國乃至世界報界做出了卓越貢獻，提供了有益的經驗。」知名新聞史學者吳廷俊在其新編著的《《大公報》全史(1902-1949)》(以下簡稱《全史》)中指出。《全史》由「報史」「年表」和「報人」三卷構成，此前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聯合出版，是中國「十四五」重點圖書規劃項目。三卷內容相輔相成，「報史」卷本着「論從史出」的治史原則，更新了以往《大公報》史研究的諸多觀點，「年表」卷為撰史準備了翔實的史料，「報人」卷則作為「報史」卷的補充，內容更為生動、豐富。

## 近三百萬字著作 做「打深井」式全史研究

# 吳廷俊：《大公報》為報界提供有益經驗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大公報》在要聞版刊登了毛澤東抵渝的消息，並在頭條位置破例刊登了一幅自製的毛澤東木刻頭像。時任《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則寫了社評《毛澤東先生來了！》。

### 論從史出：有幾分資料說幾分話

吳廷俊稱，在閱讀《大公報》史料的過程中，經常被先賢們忘己無私的精神、文章報國的情懷、穿透迷霧的眼光和駕馭文字的能力所折服，有時讀到某一篇好文章時，不禁拍案叫絕。但是，由於篇幅和行文所限，不能將這些好文章完全引用，於是便精挑細選，匯編成冊，成為《全史》的「年表」卷。

「一般來說，作者修史、使用史料時會『為我所用』，難免斷章取義甚至尋章摘句，傷害原意，「年表」卷旨在讓讀者不僅知道史料的出處，而且了解史料的完整意思。」吳廷俊強調，「論從史出」，有幾分資料說幾分話，這是治史的基本原則。但說起來易，做起來不易，主要原因是或以想像代替事實，或人云亦云，或孤立片面地看問題，或「主題先行」。撰史要堅持事事有出處，不作「無根游談」。

今次《全史》依據史料，澄清了不少此前流傳的謬誤。比如，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期間，曾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應邀到李子壩《大公報》館做客這件事，很多回憶文章都說是胡政之邀請，但實際上這次訪問是王芸生以《大公報》的名義邀請。當時胡政之根本不在重慶，甚至不在國內，一九四五年上半年他前往美國三藩市出席聯合國成立會議後沒有隨代表團回國，而是滯留美國，為報館購買器材和白報紙，直到十一月初才回國，據十一月四日《大公報》二版消息欄稱「本報總經理胡霖於昨午後抵渝」便可知。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吳廷俊即着手開展對《大公報》的研究，至今已四十餘年。大公報老報人也給予他大力支持，原香港版總編輯李俠文寄來港版文章的複印件和紀念冊，原重慶館經理王文彬根據自己的回憶提供了許多真實資料，老報人曹世瑛也將自己寫成的回憶文章寄給他參考。不滿足於學界普遍對《大公報》的斷代史研究，吳廷俊決心要做「打深井」式的全史研究。撰寫《全史》時，吳廷俊早已步入花甲之年，但他不僅堅持閱讀四十七年間塵封的舊報紙，而且還讀了大量大公報人的文集、日記、傳記、報館內部文件以及有關回憶文章。

### 編年體與紀傳體相結合

吳廷俊整理編輯了兩百多萬字的史料。他透露，《季鸞文存》《胡政之文集》以及相關回憶文章還比較容易看，難看的是報紙，閱讀早期的報紙尤為艱難，一些電子版缺少的報紙只能到資料室去看，而且，這個時期的報紙除了「附件」欄上的文章外，其餘全部是文言文，且無標點，加上字跡模糊，讀起來很費力，速度當然快不起來。每周五天泡在資料室，用了差不多一個學期的時間，才把創刊初期的報紙看了一遍，把所需要的資料抄錄在了電腦上。為了保證進度和思維的連續性，盡量減少外出活動，幾乎沒有節假日。

「我的睡眠一直不太好，大概是超負荷工作加上精神高度緊張所致。到醫院一查，血壓、血脂、血糖都很不正常，由於久坐，泌尿系統也發生炎症，難免挨家人一頓狠批。」吳廷俊稱，這部近三百萬言的史書凝聚了他幾十年的心血，到底如何，要請讀者閱看，自己只能說一句話：「我盡力了。」

《全史》撰寫從二〇一〇年即開始，最終在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七日《大公報》創刊一百二十一周年之時，並特別選在《大公報》辦報發源地天津舉辦了新書首發式。

這部新出版的《全史》不囿於常規表述框架，首次將編年體與紀傳體相結合的方法運用於新聞史研究，在兩卷「報史」之外，增設「年表」二卷和「報人」一卷，再現《大公報》史中有血有肉的個體生命，人事並重，使歷史研究充滿人文關懷。整體來看，「報史」「年表」「報

人」三部分雖在編排上各自獨立，內容上卻又相互印證，論從史出，以事察人、以人辦事，構成了新穎而不失邏輯性的體系之作，使《大公報》史的呈現既宏大又細膩、既深刻又生動。

中國新聞史學泰斗、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方漢奇對這部著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在書序中稱「本書不僅是迄今為止有關《大公報》史研究的集大成者，而且刷新了以往研究的許多史料和結論，總結出中國特有的文人辦報之經驗，代表着該領域研究的最新水平，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學術價值」。

暨南大學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陳昌鳳也曾指出，這部《全史》是目前中國新聞史個案研究的最高成就，重視從歷史研究中尋覓經驗和意義，是一部創新力作。

### 評價「功在國家，功在報界」

一九五八年，周恩來總理在談到《大公報》的歷史貢獻時說，「她是愛國的」「她是堅持抗日的」。

吳廷俊指出，這在《大公報》的辦報史上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反對喪權辱國的賣國行為，抨擊一切外國侵略者的侵略行為，為衛國權不遺餘力地呼喊。其二，呼籲廢止不平等條約，支持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群眾運動，支持收回外國租界，期盼中國在國際上取得平等地位。

「從對『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日寇『犯關』『華北事變』的記事與言論中可以看出，《大公報》對日本侵略者總是保持高度警惕，對它每次的侵略行徑均予以嚴厲痛斥。」吳廷俊提到，特別是盧溝橋事變後，《大公報》更是高舉抗戰大旗，義無反顧地衝鋒在抗擊日寇的輿論「前線」。一篇篇記載與言論，成為揭露侵略者醜惡嘴臉的銳利武器，成為鼓勵軍民抗戰的響亮號角。與此同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工作更為艱巨，《大公報》總是提醒政府，在某一條約到期時，須採取果斷行動，使「廢約」落到實處。

在辦報方針上，《大公報》則不改「文人辦報」本色，小到言論具體如何編排陳述，大到如何與社會政治、經濟活動展開良性互動，都以自身豐富的報刊實踐，為中國乃至世界報業的發展開闢了新的路徑。「《大公報》的功，八字以盡之：功在國家，功在報界。」吳廷俊認為。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大公報》的社評《報人宣誓》提出：「一個克盡厥職的新聞記者，他須具備幾個異乎常人的條件。他須有堅貞的人格，強勁的毅力，豐富的學識；對人類，對國家，對自己的職業，要有熱情，要有烈愛；然後以明敏的頭腦，熱烈的心腸，冰霜的操守，發為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勇士精神，兢兢業業的為人類，為國家，盡職服務。」



### 記者須具備「異乎常人的條件」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共有一百零八個來自中國新聞界名人的詞條，其中《大公報》人佔了十二個。另一部由中國社科院新聞所編輯出版的《中國新聞年鑒》，則為六十位大公報記者立傳。《大公報》還是迄今為止，唯一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榮譽獎章的中文報紙。

今次《全史》「報人」卷收錄了五十六位《大公報》人，作為對「報史」部分的延伸與豐富。吳廷俊指出，「大公報人」是大公精神的傳承者，他們為中國乃至世界新聞事業提供了寶貴的實際經驗和理論貢獻。

如何成為一名合格的報人？吳廷俊特別提到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當天《大公報》的社評，這篇《報人宣誓》提出：「一個克盡厥職的新聞記者，他須具備幾個異乎常人的條件。他須有堅貞的人格，強勁的毅力，豐富的學識；對人類，對國家，對自己的職業，要有熱情，要有烈愛；然後以明敏的頭腦，熱烈的心腸，冰霜的操守，發為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勇士精神，兢兢業業的為人類，為國家，盡職服務。」

吳廷俊認為，翻開新記《大公報》，其觸角不僅伸展到知識的每一個領域、社會的每一個層面，而且分析頭頭是道，說理精闢透徹，不少地方表現出了一定的預見性，都與報人的豐富學識和真知灼見分不開。

## 港版一九三八年創刊 奠定日後發展基礎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即淞滬抗戰爆發一周年紀念日，《大公報》香港版與港粵人士見面，創刊號亦接續滬版，署12384號，港館館址在香港皇后大道中三十三號三樓。

《大公報》在香港版創刊號中寫道：「中國民族解放的艱難大業，今後需要華南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們便參加到粵港同業的隊伍裏面來，想特別對於港粵及兩廣各地的同胞，與南洋同胞，服務效勞，做一點言論工作。」不過，港館創刊時，筆路藍縷，發行與廣告不夠興旺，甚至有些打不開局面。

吳廷俊指出，即便如此，創設《大公報》港館仍不失為英明之舉，其對於《大公報》的歷史甚至對於中國報業至少有三項重大意義：其一，組建了一支可貴的隊伍，培養了一批傑出的報人。其二，擴大了《大公報》在海外的影響，如大公報老報人

金誠夫所說：「尤可回憶者，世界各地，凡有中國使領館、中華會館和中華學校的地方，幾乎沒有一處不是本報港版的直接訂戶。這種情況，為國內任何地點辦報所未有。」其三，則是奠定了《大公報》今後發展的一處長久性基業。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大公報》香港版創刊號刊登《本報發行香港版的聲明》。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大公報》香港版創刊。圖為一九三九年春節，胡政之(二排左四)、張季鸞(二排左五)與香港報社同人合影。

## 研究報史力作

### 話你知

《《大公報》全史(1902-1949)》作者吳廷俊一九四五年生，湖北天門人，曾任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首任院長，並兼任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新聞教育史研究會會長，其研究成果《新記《大公報》史稿》一九九七年獲第三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優秀獎，最新出版的《《大公報》全史(1902-1949)》，被中國新聞史學泰斗方漢奇稱為是「迄今為止有關《大公報》史研究的集大成者」。